

試論《史記·殷本紀》所載 湯伐桀之戰的取材與書寫問題

古育安

摘要

本文探討《史記·殷本紀》中湯伐桀之戰的取材與書寫問題，主要針對以下兩個主題進行討論：一是司馬遷何以選擇「網開三面」傳說象徵湯德以帶出伐桀之戰，二是司馬遷如何透過對〈湯誓序〉的改寫重構伐桀戰爭的過程。本文認為司馬遷無意透過「征伐」體現湯德，因此選擇湯澤及禽獸、以德服諸侯的「網開三面」傳說書寫湯德，帶出後文的「湯乃興師率諸侯」；另外司馬遷對〈湯誓〉之誓詞發生的時間點看法與〈書序〉作者不同，因此以不同的材料為依據書寫伐桀戰爭的過程。

關鍵詞：《史記》、〈殷本紀〉、湯伐桀、取材、歷史書寫

* 拙稿疏漏之處甚多，感謝會議評論人魏慈德教授及兩位匿名審查人對拙稿的批評與指正，讓拙稿能夠避免一些重大錯誤。

** 古育安現職為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司馬遷於《史記·殷本紀》中書寫湯伐桀史事，敘述了商湯從崛起到伐桀、平定天下的過程，以〈書序〉的內容為敘述脈絡，以〈湯征〉、〈湯誓〉的內容為核心史料，搭配相關事件、傳說，取材層次分明，建構出關於這段歷史的經典敘述。近年由於出土文獻中出現不少關於商湯與伊尹的材料，多與夏商之際政權交替問題有關，帶來了不少新的研究。本文以〈殷本紀〉所載「湯伐桀之戰」為主題，從帶出伐桀之戰的「網開三面」傳說談起，聚焦於商湯伐昆吾進而伐桀此段戰爭過程，希望透過〈殷本紀〉與其他傳世、出土文獻中相關內容的比較，對司馬遷如何取材以書寫這場戰事作初步的討論，並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二、《史記·殷本紀》關於湯伐桀史事的敘述與本文的研究範圍

《史記》關於湯伐桀史事的書寫主要見於〈殷本紀〉，大致可分為兩部分，前半是關於湯崛起的敘述：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

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

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¹

這段內容以〈書序〉為脈絡進行書寫，從〈湯征序〉、可能出自〈湯征〉的內容，到伊尹往來夏商之間的傳說及相關〈書序〉內容，最後用「網開三面」傳說帶出伐桀之戰。敘述的主軸是「湯德」以及伊尹在湯崛起過程中的腳色。就商湯形象而言，先秦至西漢的傳世與出土文獻中還有其他湯伐

¹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93-95。本文提及《史記》皆依據此本，相關文本直接標示書名、頁數，不再加註。

桀的敘述，或以湯為仁義之師，或以為不義之師。²司馬遷強調「湯德」，肯定伐桀之戰的正當性，立場偏向前者，不過他在取材料上有自己的觀點，³透過與先秦相關材料的比較，可以對司馬遷如何取材書寫這段歷史有進一步的了解。

後半是關於伐桀之戰到平定天下的敘述：

當是時，夏桀為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為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

湯曰：「格女眾庶，來，女悉聽朕言。匪台小子敢行舉亂，有夏多罪，予維聞女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眾，女曰：『我君不恤我眾，捨我嗇事而割政』。女其曰：『有罪，其柰何』？夏王率止眾力，率奪夏國。有眾率怠不和，曰：『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及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理女。女毋不信，朕不食言。女不從誓言，予則帑僇女，無有攸赦。」以告令師，作〈湯誓〉。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

桀敗於有娥之虛，桀奔於鳴條。⁴夏師敗績，湯遂伐三粵，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

² 傳世文獻中先秦諸子對湯伐桀各有立場，杜正勝曾有相關整理與研究，見杜正勝：〈試論先秦時代的成湯傳說〉，《大陸雜誌》第47卷第2期（1973年8月），頁100-115。出土文獻中負面形象的湯見於《上博二容成氏》，淺野裕一對此曾有討論，見〔日〕淺野裕一：〈容成氏的禪讓與放伐〉，《戰國楚簡研究》（臺北：萬卷樓，2004年）。林錦榮曾指出二位先生文章中的一些問題，見林錦榮：《上博竹書〈容成氏〉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頁189-193。近年關於商湯形象的綜合研究可參荊玲玲：〈試論成湯形象的歷史演變〉，《出土文獻》第14輯（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4月），頁174-183。

³ 過去關於《史記》用書、取財等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早期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中的「史記總論·史記資材」部分，及金德建的《司馬遷所見書考》，藤田勝久在《〈史記〉戰國史料研究》中對相關研究有精要的回顧，書中還提到日本學者包括三上次男、栗元朋信、宮崎市定、鎌田正、吉本道雅、伊藤德男、……等人的研究。以上參〔日〕藤田勝久著，曹峰、廣瀨薰雄譯：《〈史記〉戰國史料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3-7、15。另外，阮芝生的〈太史公怎樣搜集和處理史料〉，《書目季刊》第7卷第4期（1975年3月），頁17-33，除了對司馬遷的用書、取財有詳細的整理，還全面探討司馬遷的史料觀與研究方法問題，張大可的《〈史記〉取材》，《史記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也是類似的研究。自王國維提出二重證據法以來，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對照研究成為古史研究的基本內容，王國維便是以甲骨文證明〈殷本紀〉之商世系確有所本，也說明出土文獻對《史記》史料研究的重要性。早期陳直的《史記新證》（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是這方面研究的代表，近年則有陳家寧的《〈史記〉商周史事新證圖補（壹）——殷、周、秦〈本紀〉新證圖補》（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都具有開創性。

⁴ 所據《史記》版本將「夏師敗績」斷為上句，此據〈書序〉「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

社)。伊尹報。於是諸侯畢服，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內。（《史記》，頁 95-96）

「網開三面」的故事之後是伐桀戰爭的主要內容，司馬遷也以〈書序〉為主進行書寫，並引用〈湯誓〉全文。⁵司馬遷所引〈書序〉不論是順序還是內容，都與偽古文《尚書》保留的〈書序〉有些差異，過去的學者探討司馬遷所引〈書序〉與偽古文本〈書序〉的歧異，一般聚焦於今、古文問題及二者的先後、因襲與辨偽等問題，⁶湯伐桀相關內容也在討論之列。本文認為此部分的歧異反映司馬遷與〈書序〉作者對伐桀戰爭過程的認識有所不同，而歷史認識來自各自對於史料的掌握與理解，不同的史料運用便形成了不同的敘述，因此比較這兩種對戰爭過程的不同敘述，有助於了解司馬遷如何運用史料書寫這段歷史。

本文以「湯伐桀之戰」為主題，限於篇幅，討論的內容聚焦於後半伐桀戰爭過程的取材與書寫問題，而司馬遷利用「網開三面」傳說帶出伐桀之戰，在敘述上承先啟後，因此先從此傳說談起。此外，伊尹在夏商之際的活動也是促成伐桀之戰的重要因素，文獻中留下了大量記載，先秦以來也一直是學者關注的焦點，近年由於上博簡及清華簡中出現了不少湯與伊尹的新材料，相關問題再次受到重視，至今已累積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可以參考，⁷故本文對伊尹部分不立專題討論。

三、司馬遷以「網開三面」傳說象徵「湯德」，帶出伐桀之戰

（一）〈殷本紀〉的「網開三面」傳說呼應〈夏本紀〉的「湯修德，諸侯皆歸湯」

〈夏本紀〉對湯伐桀史事的敘述如下：

三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改斷為下句。

⁵ 古國順指出〈殷本紀〉所引「除疑有錯簡外，多以訓詁字代經，計二十二字，其用今文及經後人誤改者亦有之」，相關討論參古國順：《史記述尚書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頁 242-247。

⁶ 諸家觀點各不相同，相關說法可參陳夢家：《尚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 89-97；蔣善國：《尚書綜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 71；古國順：《史記述尚書研究》，頁 381-410；程元敏：《書序通考》（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9年），頁 55-128。

⁷ 相關研究甚多，此略舉一些綜合性的碩士論文及著作，其研究回顧與引用書目中涵蓋了較多的參考資料，如溫皓月：《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之伊尹材料整理及相關問題研究》（長春：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李爽：《清華簡「伊尹」五篇集釋》（長春：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胡其偉：《伊尹與夏商之際歷史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8年）；林昕媛：《殷商伊尹歷代形象演變之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20年）；許文獻：《清華簡伊尹五篇研究》（臺北：萬卷樓，2021年）。

帝桀之時，自孔甲以來而諸侯多畔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史記》，頁 88）

〈秦本紀〉中也有相關記載：

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為湯御，以敗桀於鳴條。（《史記》，頁 174）

這段內容可視為〈夏本紀〉「諸侯皆歸湯」的實際例證，〈殷本紀〉的「網開三面」傳說則是關於「湯修德」的美談。

〈夏本紀〉所載內容其材料來源可能與《尚書大傳》有關，即《尚書大傳》「桀無道，囚湯。後釋之，諸侯八譯來朝者六國。《北堂書鈔》十《帝王部·來遠》漢南諸侯聞之，歸之四十國。《路史·後紀·夏后紀下》」，⁸不過〈夏本紀〉在「囚湯」與「諸侯歸附」之間多了「湯修德」。

〈夏本紀〉「湯修德」之後的內容基本與〈殷本紀〉「網開三面」該段及其後的內容相應，不過簡略許多。在〈夏本紀〉的敘述中，「湯修德」點出湯伐桀的「正當性」，「諸侯皆歸湯」則象徵著天命轉移，諸侯棄夏歸商，因此接著說「湯遂率兵以伐夏桀」；在〈殷本紀〉的敘述中，「網開三面」傳說後也接著說「當是時，夏桀為虐政淫荒，……遂伐桀」，「網開三面」傳說具體說明了湯如何有德，並對照桀之無德，與〈夏本紀〉的「湯修德」呼應。

根據劉嬌的整理，此事見於《呂氏春秋·異用》、《新序·雜事》、《新書·諭誠》、《新書·匈奴》、《淮南子·人間》、八角廊漢簡《儒家者言》等，亦多見於後世類書及古人注疏中，馬王堆帛書〈繆和〉中也有湯田獵德及禽獸的記載，⁹《大戴禮記·保傅》中也曾簡單引述此事曰「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二垂至」。¹⁰茲以成書時代較早且較內容完整的《呂氏春秋》為例：

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為此也？」湯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網罟，今之人學紆。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

⁸ 參〔清〕皮錫瑞：《尚書大傳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22年），頁 122。

⁹ 相關材料可參劉嬌：《言公與劉說：從出土簡帛古籍看西漢以前古籍中相同或類似內容重複出現現象》（北京：線裝書局，2012年），頁 106-108。

¹⁰ 方向東：《大戴禮記匯校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 401。

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網鳥也。¹¹

引文中提到「四十國歸之」，可知此傳說原本就在說明「湯修德，諸侯皆歸湯」。

（二）〈殷本紀〉「網開三面」傳說的取材與書寫問題

「網開三面」傳說多見於秦漢時期的文獻中，可能流傳自先秦，不過目前所見的先秦文獻中未見此傳說，而先秦文獻中另有一些可以體現湯有德，四方諸侯、人民歸附湯的說法，司馬遷卻未用以書寫「湯德」。《墨子·非命上》墨子曰：

古者湯封於亳，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¹²

這裡提到湯有德而「諸侯與之」，墨子以墨家之「德」詮釋「湯德」，司馬遷自然不會採用。

《清華柒·子犯子餘》也有此類內容，其中提到蹇叔答秦穆公曰：

昔者成湯以神事山川，以惠（德）和民。四方厓（夷）莫句（後）與人面，見湯若霽（濡？）雨，方奔之，而鹿靡（膺）女（焉），用果念政【11】九州而寧君之。遂（後）殪（世）熹（就）受（紂）之身，……暨（殷）邦之君子，無少（小）大，無遠逐（邇），見【12】受（紂）若大陸（岸）將（將）具隕（崩），方走去之，愆（懼）不死型（刑）以及于卒（厥）身，邦乃述（遂）崑（亡）。【13】¹³

學者對這段話的斷句及部分字詞有不同的解釋，根據李泰峰的整理，「四方夷」至「雨」的斷句有9種，¹⁴其中林少平認為「見湯若霽雨」與「見紂若大岸將具崩」句式相同，應於「見」前斷句，¹⁵可從，兩句前後呼應，湯與

¹¹ 王利器：《呂氏春秋注疏》（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頁1034-1036。

¹² 吳毓江：《墨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395。

¹³ 原釋文參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頁92-93。本文對「四方夷」至「鹿膺焉」的斷句稍有調整，詳下文。「念」、「政」、「寧」讀法尚無定論，此暫不破讀，相關說法可參李泰峰：《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晉國史事相關篇章集釋集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碩士論文，2020年），頁71-78。

¹⁴ 李泰峰：《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晉國史事相關篇章集釋集研究》，頁70-71。

¹⁵ 林少平：〈清華簡所見成湯「網開三面」典故〉，「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紂相對，紂使人逃去，湯使人歸附。「與」字本文從子居訓為「於」，¹⁶「人面」從陶金引《墨子·明鬼下》「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佳人面，胡敢異心」之「人面」。¹⁷「人面」即有面目者，相對於「禽獸」，¹⁸作者以「人面」指「人民」，可知他應該是將「四方夷」比為「禽獸」，反映了先秦的夷夏觀。「四方夷莫後與人面」即指成湯以德和民（人民皆已歸附）之後，四方夷亦不落人民之後（爭相歸附）。具體狀況就是「見湯若鸛雨，方奔之，而鹿膺焉」。「鸛雨」與「大岸將具崩」相對，應該是讓人親近的雨，「鸛」字說法尚無定論，¹⁹原釋文讀為「濡」，訓為「潤」，未作進一步解釋。《禮記·祭義》曰：「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²⁰「濡雨」或指潤澤萬物之雨。劉洪濤指出「而鹿膺焉」相對於「懼不死刑以及于厥身」，是對民心歸附湯的進一步描寫，「鹿膺」理解為「親附接受」，²¹可參。「方奔之，而鹿膺焉」即指四方夷奔而親附之。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子犯子餘〉關於湯該段大致的意思是：由於湯能敬祀山川、以德和民，民既已附，四夷不落人後，見湯若大旱之望時雨，亦爭相奔附之，湯因能有天下。²²其強調四夷歸附之心，所體現之「湯德」與司馬遷強調諸侯歸附之心類似。

此類說法目前僅見於出土文獻，司馬遷沒有採用，可能是因為他要強調的是「諸侯」歸附。〈殷本紀〉之「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書寫的目的如同〈周本紀〉中文王決平後，「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象徵天下諸侯意識到天命已轉移；二者在聖王形象上前後呼應，而後者帶出文王之

網站，參見：<http://www.fdgwz.org.cn/Web/Show/3022>，發表日期：2017年5月3日；瀏覽日期：2022年6月30日。

¹⁶ 子居：〈清華簡七《子犯子餘》韻讀〉，「個人圖書館」網站，參見：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1028/17/34614342_698857205.shtml，發表日期：2017年10月28日；瀏覽日期：2022年6月30日。

¹⁷ 陶金：〈清華簡七《子犯子餘》「人面」試解〉，「簡帛」網站，參見：<http://www.bsm.org.cn/?chujian/7553.html>，發表日期：2017年5月6日；瀏覽日期：2022年6月30日。

¹⁸ 吳毓江：《墨子校注》，頁358。

¹⁹ 參李泰峰：《〈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晉國史事相關篇章集釋集研究》，頁62-69。

²⁰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1310。

²¹ 劉洪濤：〈楚系古文字中的「黽（蠅）」字〉，收於鄒文玲主編：《簡帛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17。

²² 《上博二·容成氏》簡39提到商湯得知桀無德之事後，「慎戒微賢，德惠而不矧，疵三十且而能之」，「疵」、「且」二字學者有不同考釋，單育辰所釋為「柔」，何琳儀釋為「夷」，單育辰認為此句可能是「柔三十而能之」，意思是「懷柔三十夷方之國且親善牠們，即古書中之『柔遠能邇』義」。參單育辰：《新出楚簡〈容成氏〉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3月），頁216。若單說為是，則與〈子犯子餘〉之四夷歸附可以呼應。

征伐，乃至武王伐紂，前者也帶出「湯乃興師率諸侯」伐昆吾，而後伐桀。當然，也不能排除相關說法漢代已經失傳，司馬遷沒有看過此說。

最後再看《孟子·滕文公下》中的說法。孟子曰：

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²³

「葛伯仇餉」之後的內容又見於〈梁惠王下〉，用字稍有不同：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孟子正義》，頁152）

〈子犯子餘〉的整理者認為「四方夷莫後」此句是「講湯征伐夷的情形，《書》原有載，已佚，《孟子·梁惠王下》、《滕文公下》有論，文句略有不同」，²⁴這是將〈子犯子餘〉該句比擬孟子引述的「東面而征，西夷怨……」。二者可比之處在於〈子犯子餘〉之「見湯若雲雨」與上引二篇之「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雲霓）也。……誅其君，（而）弔其民，如時雨降」，然而此對照也只能說明二者對聖君如何受到人民期待的「形容」相近，實際上〈子犯子餘〉強調的是四方人民爭相歸附湯，與孟子所述四方人民希望湯來解救，剛好相反，也與〈夏本紀〉、〈殷本紀〉的諸侯歸附不同。

進一步看，孟子的「湯德」是從「湯征」一事之「征伐」開展而來，而司馬遷同樣敘述了「湯征」之事，但就「湯德」的建構而言，二者在取材與書寫立場上皆有所不同。

²³ [清]焦循：《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431-434。本文提及《孟子》皆依據此本，相關文本直接標示書名、頁數，不再加註。

²⁴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頁97。

上引兩段孟子之說以〈書〉的內容為框架，包括「湯一（始）征，自葛始（載）」、「葛伯仇餉」、「徯我后，后來其無罰（其蘇）」，所引〈書〉應即〈湯征〉；²⁵孟子以三句〈湯征〉原文穿插葛伯不祀、仇餉之事及四夷之民盼聖君解其倒懸如望時雨之事的敘述，以體現「湯德」。〈湯征〉原文以外的敘述是否也來自〈湯征〉，歷來學者有不同看法，尚無定論，²⁶不過孟子欲透過〈湯征〉闡發湯自伐葛起「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之意義，應無問題。

湯因葛伯不祀、葛伯仇餉之事而開始征伐，體現的是湯的愛民之德，「弔民伐罪」即湯一系列征伐之基調，故曰「誅其君，（而）弔其民」。〈梁惠王下〉中齊宣王問孟子「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臣弑其君，可乎？」孟子答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孟子正義》，頁 145）伐桀即「誅一夫桀」，自然也是「弔民伐罪」。²⁷

²⁵ 王鳴盛《尚書後辨》曰：「〈書序〉云：『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作〈湯征〉。』則『葛伯仇餉』及『湯一征，自葛始』云云，正〈湯征〉中語。」趙岐注以為上引兩段中前後二「書曰」指兩篇「書」，王鳴盛同意此說，參〔清〕焦循：《孟子正義》，頁 152、433。不過程元敏以為「體文氣，兩『書曰』當出一篇」，則「徯我后，后來其無罰（其蘇）」亦出自〈湯征〉。參程元敏：《書序通考》，頁 473。

²⁶ 關於葛伯不祀、葛伯仇餉之事，較具代表性的說法是金履祥認為「孟子引亳眾往耕之事疑出此書（〈湯征〉）」，參金履祥：《資治通鑑前編》，卷 3，頁 35 上，收於〔清〕永瑤、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3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頁 72。崔述則以為「此事殊瑣細，不類夏、商間事，亦不類國君之所為。……且其文頗繁碎，與《詩》、《書》皆不類」，參〔清〕崔述著，顧頡剛編：《崔東壁遺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頁 132。關於四夷之民盼聖君之事，江聲指出「湯一（始）征，自葛始（載）」之後「言『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與『天下信之』之文絕殊，信乎皆非《尚書》文也」，焦循進一步指出《公羊傳·僖公四年》有「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荀子·王制》：「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後漢書》班固奏記曰：「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為而後已？』」認為「東西而征云云，乃本周公事，孟子引以釋〈書〉耳」，參〔清〕焦循：《孟子正義》，頁 152-153。杜正勝認為「葛伯仇餉，湯一征自葛始，十一征而有天下」都是傳說，屬於成湯的傳說，並認為後面的「眾望所歸，若望雲霓之語」是另一系傳說，是周人對周公的歌頌，「孟子的成湯放桀革命論是由兩種不同傳說拼成的」，而孟子是為了闡述仁政義征思想而「演義成湯始征故事」。參杜正勝：〈試論先秦時代的成湯傳說〉，頁 108-109。杜說懷疑孟子所述。匿名審查人則認為：「通觀《孟子》，孟子解說《詩》、《書》中的史事和故事，通例都是引述關鍵語句，將其他情節融合背景改為敘事語言，文本和口說密切交融。這則故事緊密依傍『《書》曰』說出情節：『葛伯仇餉』，『湯始征，自葛載』，都是關鍵情節；引『徯我后，后來其無罰』，也密切印證『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的描述，並非外加的傳說故事。以古代的知識論來說，孟子所說有憑有據，與他講述堯舜故事的方式並無差異。」由於〈湯征〉亡佚，相關內容究竟是改寫自〈湯征〉還是來自傳說，難以進一步考證，且與本文主題非直接相關，行有餘力當另文討論。

²⁷ 唐福玖指出孟子「一夫」的概念來自〈泰誓〉，《荀子·議兵》：「誅桀、紂若誅獨夫，

四夷之民盼聖君之事又見於〈盡心下〉。孟子曰：

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孟子正義》，頁 962）

前面提到「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此處則說「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可見孟子將湯「弔民伐罪」之征伐作為「仁者無敵」觀念的「例證」。「仁者無敵」概念又見於〈盡心下〉之「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正義》，頁 959），〈梁惠王上〉談行仁政，則「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孟子正義》，頁 67-68），〈公孫丑上〉也提到能安天下之士、商、旅、農、民，「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則無敵於天下」（《孟子正義》，頁 231-232）。孟子的觀念來自孔子，見〈離樓上〉：「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孟子正義》，頁 497）

司馬遷看過《孟子》，也認可孔、孟在《詩》、《書》解釋上的思想傳承，²⁸ 孟子以弔民伐罪的湯之征伐彰顯孔子的「仁者無敵」境界，司馬遷自然不會反對，司馬遷基本上也承繼了孟子正面評價湯武革命而非視之為臣弑君的觀點，²⁹ 然而司馬遷書寫湯伐桀史事，卻不取孟子之說。

司馬遷以〈書序〉內容為敘事座標，他直接採用〈湯征序〉的「葛伯不祀，湯始征之」，用了湯與伊尹的對話，而不用孟子引述的〈湯征〉原文及葛伯不祀、葛伯仇餉之事。此對話內容是否為〈湯征〉原文，歷來學者有不同看法，未有定論，³⁰ 由於〈湯征〉亡佚，我們無從得知司馬遷是否看

故〈泰誓〉云『獨夫紂』，此之謂也。」參唐福玖：〈《孟子》引《書》與歷代《尚書》傳本的關係〉，收於林慶彰、錢宗武主編：《第二屆國際《尚書》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萬卷樓，2014年），頁 61-62。

²⁸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提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頁 2343）又說：「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頁 2342）。金德建曾指出司馬遷認為孟子「可以繼承仲尼」，其學問「是遵循了孔門《詩》、《書》之教的途徑而發展下來的」，武帝時荀學較盛，司馬遷卻如此評論孟子，「不失為一句公平正確的史筆」，參金德建：《司馬遷所見書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頁 247。

²⁹ 參陳桐生：《〈史記〉與諸子百家之學》（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 46。

³⁰ 曹娜指出，根據《史記》引〈湯誓〉、〈盤庚〉、〈高宗彤日〉例，從「湯曰」到「無有攸赦」極可能屬於〈湯征〉篇，前人多以為內容來自〈湯征〉，如王應麟、王鳴盛、莊述祖、梁玉繩、宋翔鳳、陳喬樞、陳夢家、劉起鈇、金德建，存疑或否定者如金履祥、崔述、邵懿辰、顧頡剛。參曹娜：《〈史記〉引《尚書》「商書」考論——兼論《史記》對「商書」研

過〈湯征〉，但可以確定的是司馬遷看過《孟子》而不引用其說。崔述曾於〈商考信錄〉中說：「按《孟子》之文，湯以仇餉征葛，非以不祀征葛也。《史記》此言殊失孟子之意。」³¹其實孟子以葛伯不祀、葛伯仇餉帶出湯之征伐，體現的是湯愛民之德，司馬遷引湯與伊尹的對話提到「視民知治不」，也強調湯重視人民；就〈殷本紀〉湯伐桀史事的前半部分來看，伊尹的腳色非常重要，司馬遷自有其書寫目的，他應該是選了他所看到與〈湯征〉有關的材料中，能夠說明湯之愛民，又能說明伊尹的腳色的這段對話，帶出下面的伊尹傳說與〈女鳩〉、〈女房〉之序，³²以及湯澤及禽獸的「網開三面」傳說。相較之下，孟子的書寫目的是透過〈湯征〉內容發揮湯征伐諸侯體現之義理，司馬遷則是用〈湯征序〉及〈湯征〉相關材料書寫歷史，湯伐諸侯只是整個敘事的開端，帶出後面以湯德及伊尹輔佐為主的伐桀至平天下的過程。

進一步看，司馬遷不僅在說明湯的愛民之德上選擇與孟子不同的材料，他用以說明湯得民心的具體事例也與孟子不同。孟子以四夷之民盼聖君解其倒懸之事說明湯得民心，以彰顯「仁者無敵」，仍是放在〈湯征〉此篇的「征伐」敘述脈絡中，司馬遷則是採用湯網開三面使諸侯歸附的故事，置於〈女鳩〉、〈女房〉之序後，不在〈湯征〉此篇的敘述脈絡中。可知司馬遷無意透過「征伐」體現「湯德」，其選用「網開三面」傳說，一方面將「湯德」從「愛民」提升到「澤及禽獸」之「至德」，建構聖王形象，一方面如前所述，此傳說是說諸侯因湯德而歸附，可以呼應文王之德，並帶出後文之「湯乃興師率諸侯」伐昆吾、伐桀。最後，司馬遷以「考信於六藝」為標準寫史，而在「湯德」的敘述上卻選擇用流傳甚廣的「網開三面」傳說象徵「湯以德服諸侯」，如果不是他所看到的「六藝」相關文獻中沒有足以說明「湯修德，諸侯皆歸湯」的內容，³³就是此則傳說本源自「六藝」相關文獻，只是後來失傳。

究的價值)，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經學史重探（I）——中世紀以前文獻的再檢討第三次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9年7月18-19日）。相關問題亦可參程元敏：《尚書學史》，頁183-185。另外，信者還可補江聲、簡朝亮，參古國順：《史記述尚書研究》，頁32-33；及康有為，參《新學偽經考》，《康有為全集》第1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530。

³¹ [清]崔述著，顧頡剛編：《崔東壁遺書》，頁132。

³² 伊尹傳說敘述伊尹被「任以國政」的過程，可能發生在征葛之前，為補述。

³³ 崔述認為《詩經·商頌·長發》「受小球大球……百祿是道」、「受小共大共……百祿是總」這兩段是「湯自征葛以後，諸侯已經陸續歸商也。湯德已為四方所歸，然後乃有韋、顧、昆吾之伐以除暴安民」，參[清]崔述著，顧頡剛編：《崔東壁遺書》，頁132。不過這兩段內容中並無具體關於諸侯歸湯的敘述，司馬遷沒有引用可能是因為不適合做為史料引述。

四、司馬遷對〈湯誓序〉改寫，重構湯伐桀的戰爭過程

(一) 司馬遷的問題意識：確立〈湯誓〉的時間定位

偽孔本〈湯誓序〉曰：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³⁴

作者將〈湯誓〉理解為「鳴條之戰」的誓詞。〈湯誓〉與湯伐桀有關應無問題，然而〈殷本紀〉中相應的敘述為：

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湯曰：「……」以告令師，作〈湯誓〉。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桀敗於有城之虛，桀奔於鳴條。(頁 95-96)

「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對應「伊尹相湯伐桀」，「桀敗於有城之虛，桀奔於鳴條」對應「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二者敘述同一事件，發展的過程也大致相同，但〈殷本紀〉細節較多，戰爭內容也有些差異，又將〈湯誓〉提前，說明司馬遷認為〈湯誓〉非「鳴條之戰」的誓詞。

由於漢代流傳的〈書序〉已不可得，今天看到比較完整的〈書序〉內容主要來自偽古文《尚書》及《史記》，而偽孔本〈書序〉雖非原貌，不過內容大體承襲漢代〈書序〉，學者談漢代〈書序〉問題一般還是以偽孔本與《史記》本為主。在〈書序〉真偽的問題上，或以為〈書序〉襲《史記》，或以為《史記》襲〈書序〉，前者以康有為最具代表性，他認為古文經及〈書序〉皆劉歆偽造，「〈書序〉與《史記》同者，乃〈書序〉剿《史記》」，《史記》相關內容為劉歆作偽所本。³⁵然而《史記》中之〈書序〉從何而來成為問題，崔適認為〈書序〉為劉歆偽作，託於孔子，又《史記》中的〈書序〉內容，「無論其篇名為今文、古文，凡曰『為某事作某篇』者，皆劉歆之徒據〈書序〉竄入也」，³⁶若與前說並觀，便成循環論證，故金德建又提出司馬遷之時尚無〈書序〉，《史記》與〈書序〉相同之處「是司馬遷另外根據《尚書》家向來所傳授的一些舊說，卻並不是引用〈書序〉」。³⁷劉歆偽造之說無實據，無法作為解釋二本異同之前提，而就偽孔本與《史記》相同或相近的內容來看，偽孔本〈書序〉共 67 條 81 目，古國順統計《史記》本

³⁴ 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頁 293。

³⁵ 康有為：《新學偽經考》，頁 521-522、525、529-530、532-539。

³⁶ [清]崔適：《史記探源》（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 13-14。

³⁷ 金德建：《司馬遷所見書考》，頁 59。

可比者 81 條「皆同多異少」，程元敏指出「史遷所述與書序密切相關者，凡七十三目，占總八十一目之九成勝」，他們認為此種現象反映的是《史記》因襲〈書序〉；古先生舉出諸多例證說明偽孔本的〈書序〉內容早於《史記》，程先生則將偽孔本的〈書序〉及典籍中所留下漢人提到、引用的〈書序〉對照，指出內容「大同小異，且相異之處都可考究端末，則今本書序可信」，³⁸二位學者的說法較合理，故本文同意司馬遷因襲〈書序〉之說。

古國順曾將二本〈書序〉的異同之處歸納為 6 類，前 5 類為相同或相近者，第六類是「所述內容與序稍異者」，包括〈盤庚〉、〈高宗彤日〉、〈高宗之訓〉（二篇同條）、〈西伯戡黎〉、〈微子〉、〈將蒲姑〉、〈文侯之命〉、〈秦誓〉，都是對史事認識有異，〈盤庚〉、〈高宗彤日〉、〈高宗之訓〉、〈文侯之命〉、〈秦誓〉是對事件發生的時間說法不同，〈西伯戡黎〉是對事件過程的前後順序安排不同，〈微子〉是對涉及人物的理解不同，〈將蒲姑〉是對「蒲姑」是人名還是地名說法不同；程元敏分為 11 類，認為歧異較大的僅〈盤庚〉、〈文侯之命〉、〈秦誓〉 3 篇。³⁹可知二本並非只有文字上的差異，內容亦有不同。

就〈湯誓序〉而言，古、程二位先生都歸之於二本相合之例，康有為也未列入相異之例中。⁴⁰然而從前文的對照來看，二本顯然有很大的不同。偽孔本〈湯誓序〉「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熹平石經有〈湯誓序〉殘文「遂與」二字，可知偽孔本源自歐陽本《尚書》，⁴¹應該是司馬遷看過的版本。二本的差異究竟是司馬遷別有所據，還是他對〈書序〉作了改寫，由於材料不足，很難論定。

前人對〈湯誓序〉與〈殷本紀〉相關內容的差異曾有討論，如清人汪之昌認為序文有錯簡，「作湯誓」應在「升自陟」之下，〈殷本紀〉的敘述較合理，其實宋人林之奇已指出提前比較合理，不過他也替序文說話，認為序文是總括戰事，並非以〈湯誓〉為鳴條之戰的誓詞，曰「凡若此之類，在夫學者以意逆志而得之，不可以輕重先後拘於言語文字之間而失古人大意也」，程元敏進一步認為：

³⁸ 古國順：《史記述尚書研究》，頁 381、408-410；程元敏：《書序通考》，頁 80-82、30-49、55-10。

³⁹ 古國順：《史記述尚書研究》，頁 381、391-393、402、407-408；程元敏：《書序通考》，頁 78。

⁴⁰ 康有為：《新學偽經考》，頁 529-530。

⁴¹ 參許景元：〈新出熹平石經《尚書》殘石考略〉、周鳳五：〈新出熹平石經《尚書》殘石研究〉，收於虞萬里編著：《二十世紀七朝石經專論》（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8 年）。另有學者主張為小夏侯本，相關論文亦收於此書，可參看。

二書記事必有所本，則〈書序〉「升陔、戰鳴條」云云，當亦據先秦故書，且與史記「桀走鳴條」無悖，唯列誓文於奔鳴條之前，異耳。今本湯誓絕無「升陔、戰桀鳴條」文，知非盡序者之所據，或其別有所據。⁴²

程先生的說法很有啟發性。進一步看，正因〈湯誓〉文中沒有提供誓詞的時間定位，因此不論是〈書序〉的作者還是司馬遷，都需各自找尋史料解決此一問題，而本文認為兩種敘事的差異正反映了他們的史料依據與書寫目的不同。

司馬遷的書寫目的是「寫史」。〈殷本紀〉關於湯伐桀之戰的敘述中，提供敘事脈絡的〈書序〉是第二手史料，包括〈湯誓序〉、〈典寶序〉、〈夏社序〉，對司馬遷而言〈湯誓〉應該是書寫湯伐桀之戰的第一手史料，⁴³因此全篇引用，不過〈湯誓〉全文只有誓詞，相較於《尚書》中的其他「誓」，如〈甘誓〉首句指出「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牧誓〉首句指出「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⁴⁴作為第一手史料的〈湯誓〉中並無誓師的時間、地點等訊息。若司馬遷要以〈湯誓〉為主軸串連相關內容建構出整個事件的發展過程，需要確定〈湯誓〉是哪一場戰役的誓師，因此司馬遷書寫湯伐桀之戰的「問題意識」應該就是解決〈湯誓〉的時間定位此一問題。司馬遷非常重視〈書序〉，自然需要判斷〈湯誓序〉的說法是否合理，而司馬遷可以看到的戰國史料非常多，⁴⁵他掌握的第二手史料中，與〈書序〉不同的應該不少，因此本文認為，司馬遷應該是透過相關材料形成自己對湯伐桀之戰的歷史認識，由於不同意〈書序〉作者的說法，便據以修改〈書序〉內容，其關鍵便在於他與〈書序〉作者對〈湯誓〉時間定位的理解不同。

除了〈湯誓〉之外，〈費誓〉、〈秦誓〉也未於篇中說明誓師的時間與地點。〈書序〉的作者與司馬遷對〈費誓〉的看法相同，都認為是伯禽伐淮夷徐戎的誓師之辭，而近人則指出本篇應為魯僖公時的作品，至於〈秦誓〉二人意見不同，前者以為作於秦穆公 33 年崤之戰敗歸之時，後者以

⁴² 參程元敏：《尚書學史》，頁 191-192。

⁴³ 傳統史料分類觀念可追溯至《史通》，分為「當時之簡」、「後來之筆」，20 世紀西方史學家提出「原始史料」(primary sources or original authorities) 與「轉手史料」(secondary sources or derivative authorities)，「西方近代史學家更喜將所有史料分為直接史料與間接史料」，「直接史料必須是第一手史料，或原手的史料，而不是第二手的史料，或轉手的史料」，以上參杜維運：《史學方法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第 9 章，「史料析論」。

⁴⁴ 參屈萬里：《尚書集釋》，頁 246、267。

⁴⁵ 關於《史記》用書、取材的相關研究，可參註 3。

為作於秦穆公 36 年報崤之役時。⁴⁶這也說明司馬遷與〈書序〉作者面對的是同樣的問題，他們在遇到「書」的內容無法給出確切的時空定位時，都需要透過自己的歷史認識進行判斷並書寫，雖然〈書序〉作者的寫作目的不是「寫史」，但從偽孔本〈湯誓序〉中還是可以看出作者對湯伐桀之戰的歷史認識。

（二）司馬遷修改〈湯誓序〉的史料依據

1. 《尚書校釋譯論》對〈殷本紀〉「桀敗於有娥之虛，桀奔於鳴條」的解釋

偽孔本〈湯誓序〉：「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殷本紀〉改為「桀敗於有娥之虛，桀奔於鳴條」，並引用〈湯誓〉全文，將其移至「桀敗於有娥之虛」之前，確立第一場伐桀戰役及誓師發生在桀逃到鳴條之前。

二者對湯伐桀之戰的敘述不同，反映了他們歷史認識的不同，他們的歷史認識來自各自所據史料的運用與書寫立場。前輩學者中，顧頡剛、劉起鈞在《尚書校釋譯論》中談「有娥之虛」問題時曾觸及到〈殷本紀〉關於湯伐桀之戰的書寫問題，他們認為：

按《殷本紀》於此處叙為「桀敗於有娥之虛。桀奔於鳴條」。顯然是司馬遷照抄的兩條史料原文，拼湊在一起，所以每一句都有「桀」作主語，沒有顧及潤色文字。這裏有兩個可能：一是本來就是先後兩件史事的史料，一是這兩條史料是同一史事的傳聞異詞。⁴⁷

這段話談的就是「桀敗於有娥之虛，桀奔於鳴條」的史料運用與書寫立場。這段話很有啟發性，不過提出的解釋有所侷限。就史料依據而言，顧頡剛曾在〈有仍國考〉中指出「有娥」即《韓非子·十過》「桀為有戎之會，有緡叛之」的「有戎」，《左傳·昭公四年》作「有仍」，〈隱公二年〉「公會戎於潛」，杜預注：「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地在今山東曹縣，又「仍」即「任」，「有緡」在今山東兗州以西一帶，「任」在今山東濟寧縣，三地近，「戎、緡、任皆一族之國也」，⁴⁸以此為基礎，《尚書校釋譯論》進一步認為「桀敗於有娥之虛」與「桀奔於鳴條」若非先後於同一地區發生的戰事，就是同一戰事在流傳過程中分化為兩件事。關於前一說法，由於「韋」在今豫北東部的滑縣以東、「顧」在今魯西范縣南及豫北濮陽東之地，在湯都

⁴⁶ 參屈萬里：《尚書集釋》，頁 305-306。

⁴⁷ 顧頡剛、劉起鈞：《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頁 894。

⁴⁸ 顧頡剛，〈有仍國考〉，《古史辨》第 7 冊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頁 324-329。

亳的北方，據雷學淇考證有娥即有莘，「湯伐桀，桀與韋顧之君拒湯於有莘之墟」，有娥之戰即有莘之戰，發生在伐韋、顧之時；而對後一說法，他們認為「鳴條」在今開封、陳留一帶，而「有娥」即「有戎」，亦在今開封、陳留一帶。兩種可能中，他們認為後一種「同一史事傳聞異詞」的可能性較大。⁴⁹書寫立場方面，他們認為司馬遷只是拼湊史料，並以顧頡剛早期對「有娥之墟」的考證為論斷的基礎，認為兩則史料為同一事件分化而成，間接指涉司馬遷對史料的認識不足而拼湊史料。

然而，此說最大的問題就是以顧頡剛對「有娥之墟」的考證為前提。在先秦文獻中，「有娥」此地有多種寫法，「有娥」未必是原貌，其地望的考證亦可商（詳下文）。本文認為司馬遷如何書寫「桀敗於有娥之墟，桀奔於鳴條」的關鍵還是確立〈湯誓〉的時間定位及對〈湯誓序〉的反思問題，司馬遷不是拼湊史料，而是選擇他認為能夠合理建構湯伐桀之戰的史料，所選史料的內容也非同事之分化。

2. 將「升自陟」改為「桀敗於有娥之墟」的史料依據

古國順曾認為〈股本紀〉引〈湯誓序〉「不言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蓋夏本紀已載『桀走鳴條』，故略之也」，⁵⁰並將〈股本紀〉「湯乃興師」至「遂伐桀」的內容歸於《史記》引述之內容意與偽孔本〈湯誓序〉合之例。此說忽略了〈股本紀〉引〈湯誓〉後還有「桀敗於有娥之墟，桀奔於鳴條」二句，沒有意識到司馬遷是將「陟」改為「有娥之墟」，並且將戰爭提前至「有娥之墟（陟）」。

傳世文獻中，與「有娥之墟」對應的還有「郟」，《呂氏春秋·簡選》：

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郟，遂禽推移、大犧，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桀奔走。⁵¹

在「登自鳴條」之前已先有一戰。司馬遷接觸的史料中此類敘述應該不少，才能支持他將伐桀的主要戰役提前。出土文獻便有類似內容，如《上博二·容成氏》：

湯……從而攻之，陞自戎述（遂），內（入）自北【39】門，立於中余（塗）。傑（桀）乃逃之鬲（歷）山是（氏）。湯或（又）從而攻之，陞（降）自鳴攸（條）之述（遂），呂（以）伐高神之

⁴⁹ 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頁 894-896。

⁵⁰ 古國順：《史記述尚書研究》，頁 386。

⁵¹ 王利器：《呂氏春秋注疏》，頁 803-805。

門，傑（桀）乃逃之南巢（巢）是（氏）。湯或（又）從而攻之，
【40】述（遂）逃迭（去），之桑（蒼）梧之野。【41】⁵²

許全勝指出「戎遂」即〈湯誓序〉之「陟遂」（將「遂」字上讀），「戎」（日母冬部）、「陟」（日母蒸部）音近可通，〈殷本紀〉「有娥之虛」於《路史》作「娥虛」，即「戎遂」、「陟遂」，又認為：

「邲遂」之戰位於鳴條之戰前，與簡文「戎遂」相當，故頗疑即「戎遂」之誤，邲從邑、成聲。「成」、「戎」二字形近易訛，蓋「戎」先誤為「成」，以其為地名，後人又妄加邑旁作「邲」矣。⁵³

說皆可從。與《呂氏春秋·簡選》呼應的還有《墨子·明鬼下》：

湯以車九兩，鳥陳厲行，湯乘大贊，犯遂下眾人之螭遂，王乎禽推哆、大戲。⁵⁴

「犯遂下眾人之螭遂」孫詒讓以為當作「犯逐夏眾，入之郊遂」，⁵⁵許全勝同意孫說，認為「螭遂」與簡文「高神之門」有關，⁵⁶不過「入之螭遂」在「禽推哆、大戲」之前，對應的應該是〈簡選〉的「戰於邲」、「容成氏」的「陞自戎遂」及〈殷本紀〉的「敗於有娥之虛」，在「鳴條」之前，應與「高神之門」無關，此句錯字較多，本文認為「螭」字很可能是「融」字之訛，漢代「融」字或作融（流沙簡·屯戍 2.14）、融（亳縣鳳皇臺一號漢墓剛卯）、融（白石神君碑）、融（漢印）等形，⁵⁷左邊偏旁與「高」相近，或許是漢人在傳鈔過程產生的訛誤，「融」（餘母冬部）、「戎」（日母冬部），韻部相同，聲母同為舌音，音近可通，「戎」與餘母之「容」亦有通假之例。⁵⁸

另外，許先生還提到《國語·周語上》「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之「聆隧」，《說文·耳部》引作「聆遂」，《左傳·莊公 32 年》、〈昭公 18 年〉孔疏及《後漢書·楊賜傳》李注引作「黔隧」，

⁵² 釋文參考單育辰：《新出楚簡〈容成氏〉研究》，頁 207-219。單先生從許全勝之說讀「戎」為「陟」，本文認為此字為地名，本字為何難以論定，暫不破讀。「余」字作「𠄎」，字形特殊，單先生以為是「余」字訛變，讀為「塗」，指「都城居於中央的大道」。

⁵³ 許全勝：〈《容成氏》篇釋地〉，收於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所編：《上海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 年），頁 372、373。

⁵⁴ 吳毓江：《墨子校注》，頁 365。

⁵⁵ 同上註。

⁵⁶ 許全勝：〈《容成氏》篇釋地〉，頁 375。

⁵⁷ 徐中舒：《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5 年），頁 189。

⁵⁸ 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 年），頁 976。

《說苑·辯物》作「亭隧」，認為「聆」、「黔」（群母侵部）與「戎」（日母冬部）韻近聲遠，二者應非一地，又舉〈容成氏〉「陞自戎遂，入自北門」與《墨子·非攻下》提到湯伐桀時「天命融隆火於夏之西北隅」徐元誥以為即「聆隧」所在，「戎遂」在夏都之北，「聆隧」與「戎遂」相距應該不遠。⁵⁹

白於藍則認為二者為一地，他提到銀雀山漢簡《孫子兵法·黃帝伐赤帝》有如下內容：

武王伐紂，至於茲遂，【176】戰牧之野，右陰，順術，〔倍衝，大威〕有之。【177】⁶⁰

指出「茲遂」與《說苑·權謀》的「武王伐紂，……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的「有戎之隧」關係密切，並連繫到上舉與夏朝滅亡有關的地名「聆（黔、亭）隧」、「戎遂」、「有戎之虛」、「陋遂」，認為可能是同一地，並進一步指出：

聆從今聲。茲從斂聲，斂則從金聲。傳世文獻中從今聲之字與從金聲之字常可互通，出土楚簡亦常見互通之例。可見聆、茲古音很近，例可相通。上古音聆為群母侵部字，戎為日母冬部字。從韻母看，二字冬侵合韻。從聲母上看，戎為舌音，聆為喉音，看似有一定距離。但與聆同從今聲的念、貪等字聲母亦為舌音。前引「聆隧」在《說苑·辯物》中作「亭隧」，亭字聲母亦為舌音。典籍中戎與從今聲之字均可與從壬聲之字相通，《儀禮·聘禮》：「賜饗，唯羹飪。」鄭玄《注》：「古文羹為羔，飪作稔。」《爾雅·釋言》：「饋、餽，稔也。」陸德明《釋文》：「稔，字又作餽。」《詩·大雅·生民》：「茲之荏菹。」《周禮·天官·大宰》賈《疏》引荏作戎。可見聆與戎亦當可通。⁶¹

白先生對聲音關係的解釋應較合理，而伐紂與伐桀這兩組地名在用字上都分別用了冬部字與侵部字，也能對應，可以說明伐桀該組地名非指二地。至於二組地名若指同一地點，則武王伐紂曾經過湯伐桀決戰之地，或可做為地望考證的依據（下文略作推測，見註 68），然而目前材料不足，也不能排除伐桀與伐紂兩組地名其中一組有誤植、訛混或刻意類比的情況。

⁵⁹ 許全勝：《〈容成氏〉篇釋地》，頁 374。

⁶⁰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釋文注釋」，頁 32。

⁶¹ 白於藍：《銀雀山漢簡校釋》，《考古》2010 年第 12 期，頁 81-82。

王坤鵬曾指出：

《史記》的《夏本紀》、《殷本紀》中記述湯伐桀之事俱只記述了一次戰鬥，即發生在桀都之外有娥之墟的戰鬥，當是因為這次戰爭之後，湯攻占了夏都，名義上已經取代了夏朝。這一點在《容成氏》中也得到了證明。《容成氏》記述湯伐桀，也只是「降自戎遂，入自北門」這樣一次戰鬥，就攻破了桀都，其後所記都是桀逃跑的路線。⁶²

〈夏本紀〉曰：「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對照〈殷本紀〉可知「桀走」之前當於「有娥之墟」有決定性的一戰，與湯伐桀敘述中的「邲」（〈簡選〉）、「螭」（〈明鬼下〉）、「戎遂」（〈容成氏〉）應該是指同一個地點，司馬遷應該就是參考了與〈容成氏〉類似說法的材料，⁶³他看到的地名大概是「戎遂」、「有戎之隧」之類，因而將「升自陟」改為「桀敗於有娥之墟」，並將〈湯誓〉移到此句之前。

從這些地名的用字來看，很難確定何者為本字，因此顧頡剛以〈殷本紀〉的「有娥」此族為基準考證的地點可商。清華簡〈尹至〉出現後，此地又可聯繫到「西邑夏」。《清華壹·尹至》簡5：「自西戡（捷）西邑，穹（戎）元（其）又（有）踰（夏）罍（播）民內（入）于水，曰罍（戰）。帝曰：『一勿遺。』」⁶⁴此「西邑夏」應該在「戎遂」附近，以「西邑夏」作為考證的基準應更合理。

「西邑夏」指桀都，前面提到〈容成氏〉「陞自戎遂，入自北門」之「戎遂」在桀都城之北，可知這一系列地名應該就在桀都附近。學者對「西邑夏」的討論建立在過去對桀都的研究上，或以為即偃師商城，在伊、洛一帶（沈建華），或以為在山東濰坊，近「有仍」（王寧），或以為在晉南「夏虛」（陳民鎮），⁶⁵近年李凱對相關說法做了詳細的檢討，指出王說之誤，認

⁶² 王坤鵬：《近出古書與早期史學源流》（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75-76。

⁶³ 〈夏本紀〉關於禹、啟繼位關係的說法中，司馬遷對啟、益關係的說法承襲孟子，不過孟子沒有提到益之前禹、益之間還有讓位給皋陶之事，此事益見於〈容成氏〉，說明司馬遷確實掌握了一些與今天看到的出土文獻內容相近而沒有流傳到後代的材料。相關討論可參拙著：《戰國時代的古史記憶——虞夏之際篇》（臺北：萬卷樓，2019年），頁257-259。

⁶⁴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頁128。關於「捷」的考釋問題，可參劉洪濤：《形體特點對古文字考釋重要性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頁183-190。

⁶⁵ 參沈建華：〈清華楚簡《尹至》釋文試解〉，《中國史研究》2011年第1期。王寧：〈清華簡《尹至》、《尹誥》中「西邑」和「西邑夏」的問題〉，「國學復興網」網站，參見：<https://www.gxfxwh.com/article-58-1.html>，發表日期：2014年1月20日；瀏覽日期：2022年6月30日。原文發表於「簡帛研究」網站（<http://www.jianbo.org/admin3/2011/wangning001>）。

為「陟」在夏都之西，即偃師二里頭之西，嵩山萬安山脈西麓。⁶⁶蔡哲茂先生也指出王說之誤，並在胡厚宣、劉桓與陳劍的研究基礎上，指出卜辭作為祭祀對象的「西邑」與文獻中的「西邑夏」皆指夏王朝，前者是商人對夏的稱呼，是夏王朝歷代亡靈的代稱，後者指夏都，而夏王朝故地後來由崇侯控制，在伊、洛一帶。⁶⁷此從蔡先生之說。⁶⁸

至於〈湯誓序〉的「陟」也是同一地點，不過〈書序〉的作者選擇相信另一類敘述。〈書序〉是為了介紹「書」的內容而作，不是為了「寫史」，由於〈湯誓〉未提及任何時間背景的訊息，故作者仍需依據他的歷史認識進行書寫。先秦、西漢文獻中有如下記載：

伊尹再逃湯而之桀，再逃桀而之湯，果與鳴條之戰，而以湯為天子。（《戰國策·燕策二》）⁶⁹

湯與桀戰於鳴條之野，武王與紂戰於牧野之中。（《商君書·賞刑》）⁷⁰

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于商，三年而桀乃亡；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朞年而紂乃亡。故聖人見存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待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淮南子·汜論訓》）

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於南巢，放之夏臺，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于宣室。（《淮南子·本經訓》）

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淮南子·主術訓》）

htm)，2011年1月19日，已無法檢索。陳民鎮：〈清華簡伊尹諸篇與商湯居地及伐桀路線考〉，《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4卷第2期（2018年3月），頁1-11。

⁶⁶ 李凱：〈《尚書·湯誓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新證〉，《出土文獻與商周文明初探》（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8年），頁44。此文承蒙黃澤鈞博士告知，特此致謝。

⁶⁷ 蔡哲茂：〈夏王朝存在新證——說殷卜辭的「西邑」〉，《中國文化》第44期（2016年3月），頁47-51。

⁶⁸ 如前所述，若能證明伐桀的「戎遂」該組地名即武王伐紂敘述中出現的「蕞遂」、「有戎之隧」，則此地應該在武王伐紂的路線上。《說苑·權謀》「武王伐紂，……至於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韓詩外傳》卷三「武王伐紂，到于邢丘，輒折為三，天雨三日不休」，「有戎之隧」與「刑丘」對應，此邢丘在今溫縣一帶，武王伐紂「師渡孟津」，邢丘正在孟津對岸，北上牧野必經此地，而孟津地近伊、洛入河之處，在偃師北，若「有戎之隧」為湯伐桀之「戎遂」，則偃師商城應即桀都「西邑夏」，便是由北而南攻入桀都。《墨子·非攻下》「天命融隆火於夏之西北隅」，〈容成氏〉「陞自戎遂，入自北門」，〈尹至〉「自西捷西邑」，湯與桀戰於「戎遂」後自西北進入「西邑夏」。以上略作推測，存此備考。

⁶⁹ 諸祖耿：《戰國策集注匯考（增訂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頁1590。

⁷⁰ 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頁98-99。

（湯）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淮南子·修務訓》）⁷¹

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說苑·權謀》）⁷²

這些材料都只提到鳴條之戰（包含南巢），第二、三、四條將鳴條之戰與牧野之戰相提並論，容易讓人將二者類比。比較特別的是《呂氏春秋·慎大》說湯伐桀「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體離散，為天下戮」，⁷³湯攻進桀都時桀未戰而走，之後湯追擊桀至大沙（即南巢）才有一戰。⁷⁴〈書序〉作者應該是受到這類說法影響，而將〈湯誓〉視為鳴條之戰的誓詞。

綜上可知，〈湯誓序〉依據的材料自先秦至漢說法差異不大，而與司馬遷的說法有關的材料不僅歧異較多，用字也多有不同，類似的說法又見於今天看到的出土文獻中，說明司馬遷用的材料很可能來自漢代流傳的先秦「古文」材料，反映了司馬遷對史料考訂「不離古文者近是」的原則。⁷⁵

3. 〈湯誓〉誓師時間的三種可能

偽孔本〈湯誓序〉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司馬遷將「伊尹相湯伐桀」改為「當是時，夏桀為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為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重構了伐桀之戰前的征伐過程，並指出伊尹參與了伐昆吾、伐桀等戰役。

伐昆吾、夏桀見於《詩經·商頌·長發》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⁷⁶伊尹一般的形象是「相湯」，⁷⁷而《呂氏春秋·慎大》曰：

湯與伊尹盟，以誓必滅夏。……商涸旱，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⁷⁸

⁷¹ 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頁946、580、627、1315。

⁷² 劉向著，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329。

⁷³ 王利器：《呂氏春秋注疏》，頁1617。

⁷⁴ 大沙即南巢，參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頁131。

⁷⁵ 關於司馬遷「史料考訂」的原則，可參阮芝生：〈太史公怎樣搜集和處理史料〉，頁25-26。

⁷⁶ 屈萬里：《詩經詮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1983年），頁624。

⁷⁷ 一般認為伊尹是出身微賤的輔政大臣，戰國時代關於伊尹身分的傳說很多，如「庖人」、「媵臣」、「處士」、「賤人」、「私臣」、「酒保」、「間諜」等，參蔡哲茂：〈伊尹傳說的研究〉，《中國神話與傳說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97年9月）。荊玲玲：〈先秦時期伊尹形象的演變〉，《出土文獻》第11輯（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10月），頁184-193。

⁷⁸ 王利器：《呂氏春秋注疏》，頁1615-1617。

從二人盟誓及湯遵守盟誓出兵來看，可以推測伊尹的地位很高且參與了戰爭。⁷⁹類似的敘述也見於清華簡〈尹至〉：

湯𠄎(盟)𠄎(質)𠄎(及)尹，𠄎(茲)乃柔大𠄎。湯𠄎(往)【4】
𠄎(征)弗𠄎(附)。執(摯)𠄎(度)，執(摯)𠄎(德)不𠄎(僭)。
自西𠄎(戠)西邑，𠄎(戠)𠄎(其)又(有)𠄎(夏)𠄎(夏)𠄎(播)民內(入)于水，曰𠄎(戰)。帝曰：「一勿遺。」【5】⁸⁰

「湯往征弗附」或即〈長發〉所載伐韋、顧、昆吾之事。⁸¹

〈殷本紀〉曰「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尹至〉則是伊尹與湯盟誓後湯便興師「征服附」，伊尹配合征伐，而後伐桀，敘述基本相合，不過〈殷本紀〉沒有湯與伊尹盟誓的說法，並且只提到伐昆吾，沒有完全依照〈長發〉所述，也與〈尹至〉籠統的「征服附」不同。司馬遷在〈十二諸侯年表〉、〈呂不韋列傳〉中都提到《呂氏春秋》，他應該看過〈慎大〉，卻捨棄了「湯與伊尹盟」的說法，而《史記》引《詩》之處甚多，司馬遷自然熟悉《詩經》，卻不提「韋」、「顧」，可知司馬遷對史料有所取捨，是自己剪裁史料作的敘述，〈殷本紀〉與〈尹至〉敘述雖然類似，但司馬遷應該沒看過〈尹至〉，或者看過而未受影響。

進一步看，司馬遷將〈湯誓〉提前並加入湯興師伐昆吾之事後，出現兩個可能的誓師時間點，第一是有娥之戰前，第二是興師伐昆吾前。〈尹至〉則提供了第三個時間點，即伐韋、顧前。

前文提到宋人林之奇與清人汪之昌都認為〈殷本紀〉將〈湯誓〉提前的敘述較合理，〈尹至〉出現後，當代學者也談到此問題，如程浩認為〈湯誓〉「是商湯伐桀時戰於鳴條所作的誓師詞」，⁸²唐福玖將〈尹至〉與〈殷本

⁷⁹ 學者結合甲骨文中伊尹受祭的地位來看，或以為伊尹為一族之長，相關研究非常多，較具代表性的論文有：杜正勝：〈試論先秦時代的成湯傳說〉；張政烺：〈釋「它示」——論卜辭中沒有蠶神〉，《張政烺文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514-520；徐喜辰：〈論伊尹的出身及其在湯伐桀中的作用〉，《人文雜誌》1990年第3期；蔡哲茂：〈殷卜辭「伊尹鬯示考」——兼論「它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8本第4分（1987年12月），頁755-808。

⁸⁰ 釋文參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頁128。「質」、「附」從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清華簡〈尹至〉、《尹誥》研讀札記（附：《尹至》、《尹誥》、《程寤》釋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參見<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352>，發表日期：2011年1月5日；瀏覽日期：2022年6月30日。

⁸¹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頁130。

⁸² 程浩：《「書」類文獻先秦流傳考——以清華藏戰國竹簡為中心》（北京：清華大學博士論

紀》對照，認為〈湯誓〉應作於「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這個時間段。⁸³值得注意的是林之奇之說，他認為誓詞「必是其始興師之時，誓眾於亳邑之辭。既誓而後往伐桀，升自陟以與桀戰于鳴條之野」，「非是行陣於鳴條、臨戰而後誓，若〈牧誓〉之類也」。⁸⁴林之奇從〈湯誓序〉的文本著眼，因此沒有有娥之戰，也沒有伐昆吾，所謂「始興師」指起兵準備伐桀之時；若從〈殷本紀〉來看，「始興師」從伐昆吾算起，從〈尹至〉來看，可能從伐韋、顧算起。

司馬遷將〈湯誓〉的內容插在「遂伐桀」與「桀敗於有娥之虛」之間，確有可能將〈湯誓〉理解為有娥之戰的誓詞，不過他又說「湯自把鉞以伐昆吾」，〈牧誓〉中武王誓師時「左杖黃鉞，右秉白旄」，司馬遷在伐昆吾前加上「自把鉞」耐人尋味，而誓詞中未提到昆吾，應該不是針對昆吾的征伐，比較可能是將伐昆吾、夏桀視為同一征伐，誓師的目的是伐桀，伐昆吾是這場伐桀戰役的開端。⁸⁵另外，〈尹至〉中湯與伊尹盟誓後便出兵，學者指出〈尹至〉中伊尹所述多與〈湯誓〉互見，應該是被用到誓詞中，⁸⁶因此〈湯誓〉也可能是「湯往征弗附」時的誓詞，征伐對象應該包含韋、顧，則「始興師」的時間點早於伐昆吾。

由於材料不足，很難判斷誓師在哪個時間點，本文認為發生在始興師伐桀之時的可能性較高，〈湯誓〉提到「夏德若茲，今朕必往」，也比較像準備起兵伐桀時的表述，而非有娥之戰或鳴條之戰臨戰前的誓詞。至於始興師伐桀是在伐韋、顧之時還是伐昆吾之時，沒有足夠的材料可以進一步討論，只能說〈尹至〉與〈殷本紀〉可能傳達了不同的訊息。

五、結語

本文討論《史記·殷本紀》中湯伐桀之戰的取材與書寫問題，從「網開三面」傳說談起，並探討司馬遷如何運用史料改寫〈湯誓序〉，重構湯伐桀之戰。

文，2015年），頁128。

⁸³ 唐福玖：〈《孟子》引《書》與歷代《尚書》傳本的關係〉，頁73-74。

⁸⁴ 參程元敏：《尚書學史》，頁191-192。

⁸⁵ 匿名審查人提醒筆者：「漢代人有關昆吾和桀『同日而亡』這類說法，將『昆吾夏桀』視為連續性的戰爭。以地理言，《左傳》中提到兩處昆吾居地，一在衛，一在『舊』之地，即鄭國。若桀都在伊、洛一帶（作者採此說），昆吾在舊許，則昆吾和桀都的關係，恰如春秋初年的鄭國和周王室般唇齒相依，則不論『陟』為何地，視為同一次的征伐也是合理的，不必然得在二者擇一。畢竟〈湯誓〉的內容只針對夏桀而沒提到昆吾。」

⁸⁶ 參程浩：《「書」類文獻先秦流傳考——以清華藏戰國竹簡為中心》，頁128-129；唐福玖：〈《孟子》引《書》與歷代《尚書》傳本的關係〉，頁73-74

〈殷本紀〉中，司馬遷透過「網開三面」傳說象徵湯以德服諸侯，與〈夏本紀〉的「湯修德，諸侯皆歸湯」呼應。此事見於《呂氏春秋·異用》、《新序·雜事》、《新書·論誠》、《新書·匈奴》、《淮南子·人間》、八角廊漢簡《儒家者言》及後世類書及古人注疏中，相關內容還見於馬王堆帛書〈繆和〉、《大戴禮記·保傅》，而先秦文獻中另有一些體現湯有德使人民歸附湯的說法，見於《墨子·非命上》、《清華柒·子犯子餘》、《孟子·滕文公下》，司馬遷卻未用以書寫「湯德」。

〈非命上〉墨子以墨家之「德」詮釋「湯德」，自然不被採用。〈子犯子餘〉提到湯有德使四夷歸附，司馬遷可能是為了強調「諸侯」歸附而不採用。〈殷本紀〉之「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與〈周本紀〉之「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都象徵天下諸侯意識到天命已轉移，在聖王形象上前後呼應，且〈殷本紀〉強調諸侯歸附，可以帶出後文「湯乃興師率諸侯」伐昆吾、夏桀。當然也不能排除司馬遷之時相關說法已經失傳。《孟子·滕文公下》以三句〈湯征〉原文穿插葛伯不祀、仇餉之事及四夷之民盼聖君解其倒懸如望時雨之事體現湯愛民之德，透過〈湯征〉闡發湯自伐葛起「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中「弔民伐罪」、「仁者無敵」的思想。司馬遷看過《孟子》，應該也同意孟子的詮釋，卻不取孟子之說。司馬遷用〈湯征序〉及關於湯重視人民的一段與伊尹的對話作為湯伐桀史事的開端，帶出下面的伊尹傳說、與伊尹有關的〈書序〉，以及湯澤及禽獸的「網開三面」傳說。司馬遷無意透過「征伐」體現湯德，並將湯的愛民之德提升到澤及禽獸之「至德」，一方面呼應〈周本紀〉的文王之德，一方面帶出後文「湯乃興師率諸侯」。司馬遷寫史的原則是「考信於六藝」，卻選用「網開三面」傳說象徵「湯以德服諸侯」，若非「六藝」相關文獻中沒有足以說明「湯以德服諸侯」的內容，就是此傳說源自「六藝」相關文獻，後來失傳。

〈殷本紀〉中，司馬遷參考了〈湯誓序〉書寫伐桀之戰，但文字內容與〈湯誓序〉有很大的不同：其一，將〈湯誓序〉的「升自陟」改為「桀敗於有娥之虛」；其二，〈湯誓序〉僅有鳴條之戰，〈殷本紀〉在鳴條之戰前還有有娥之戰，並將〈湯誓〉引文放在此戰之前；其三，將〈湯誓序〉的「伊尹相湯伐桀」增補為伐桀戰前以伐昆吾主的征伐過程。本文認為這些差異反映的是〈書序〉的作者與司馬遷對此段歷史的認識不同，由於〈湯誓〉文中沒有提供誓詞的時間定位，他們在書寫相關內容的過程中都需找尋史料解決此一問題，因而建構出不同的敘述。

司馬遷以為鳴條之戰前還有一戰，文獻中有相關記載，如《呂氏春秋·簡選》的「戰於邲」，《上博二·容成氏》有「陞自戎遂」，《墨子·明鬼下》有「入之螭遂」，「成」為「戎」之誤、「螭」應為「融」之誤，《國語·周語上》夏亡時「回祿信於聆（黔、亭）隧」，「戎」、「融」、「聆」、「黔」、「亭」通假，指同一地。司馬遷應該參考了與〈容成氏〉類似說法的材料，將「升自陟」改為「桀敗於有娥之虛」，並將〈湯誓〉移到此句之前。此地又可聯繫到清華簡〈尹至〉中的桀都「西邑夏」，學者以為桀都在伊、洛一帶，或即偃師商城。至於〈湯誓序〉也有史料依據，先秦、西漢文獻中有不少只提到鳴條之戰（包含南巢）的材料，其中或將鳴條之戰與牧野之戰相提並論，亦有湯攻進桀都時桀未戰而走之說，〈書序〉作者應該是受到這類說法影響，而將〈湯誓〉視為鳴條之戰的誓詞。

最後，司馬遷修改〈湯誓序〉重構伐桀之戰後，出現三個誓師的可能時間點，一是有娥之戰前，二是伐昆吾前，〈尹至〉提供了第三個可能的時間點，即伐韋、顧前，後二者指涉的是「始興師」伐桀之時。〈湯誓〉提到「夏德若茲，今朕必往」，不像臨戰前的誓詞，比較可能是起兵伐桀之時的誓詞，至於誓師的時間點是伐昆吾之時還是伐韋、顧之時，目前材料不足，難以論定。

徵引文獻

專著

-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 〔漢〕劉向著，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宋〕金履祥：《資治通鑑前編》，收入〔清〕永瑤、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3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清〕崔述著，顧頡剛編：《崔東壁遺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 〔清〕崔適：《史記探源》，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清〕皮錫瑞：《尚書大傳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22年。
- 〔清〕焦循：《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方向東：《大戴禮記匯校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王利器：《呂氏春秋注疏》，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
- 王坤鵬：《近出古書與早期史學源流》，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17年。
- 古育安：《戰國時代的古史記憶——虞夏之際篇》，臺北：萬卷樓，2019年。

- 古國順：《史記述尚書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
- 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
- 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
- 吳毓江：《墨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李凱：《出土文獻與商周文明初探》，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8年。
- 李學勤：《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
-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
-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 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
- ：《詩經詮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
- 金德建：《司馬遷所見書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
- 徐中舒：《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5年。
- 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康有為全集》第1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
- 張大可：《史記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
- 張政烺：《張政烺文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 陳直：《史記新證》，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 陳家寧：《《史記》商周史事新證圖補（壹）——殷、周、秦〈本紀〉新證圖補》，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
- 陳桐生：《《史記》與諸子百家之學》，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6年。
- 陳夢家：《尚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 單育辰：《新出楚簡《容成氏》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3月。
- 程元敏：《書序通考》，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9年。
- 虞萬里編著：《二十世紀七朝石經專論》，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8年。
-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 劉洪濤：《形體特點對古文字考釋重要性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
- 劉嬌：《言公與剿說：從出土簡帛古籍看西漢以前古籍中相同或類似內容重複出現現象》，北京：線裝書局，2012年。
- 蔣善國：《尚書綜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 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
- 諸祖耿：《戰國策集注匯考（增訂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
- 顧頡剛、劉起鈞：《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 顧頡剛：《古史辨》第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 〔日〕淺野裕一：《戰國楚簡研究》，臺北：萬卷樓，2004年。
- 〔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天工書局，1993年。

〔日〕藤田勝久著，曹峰、廣瀨薰雄譯：《《史記》戰國史料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期刊與專書論文

- 白於藍：〈銀雀山漢簡校釋〉，《考古》2010年第12期。
- 杜正勝：〈試論先秦時代的成湯傳說〉，《大陸雜誌》第47卷第2期，1973年8月。
- 沈建華：〈清華楚簡《尹至》釋文試解〉，《中國史研究》2011年第1期。
- 阮芝生：〈太史公怎樣搜集和處理史料〉，《書目季刊》第7卷第4期，1975年3月。
- 徐喜辰：〈論伊尹的出身及其在湯伐桀中的作用〉，《人文雜誌》1990年第3期。
- 荊玲玲：〈先秦時期伊尹形象的演變〉，《出土文獻》第11輯，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10月。
- ：〈試論成湯形象的歷史演變〉，《出土文獻》第14輯，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4月。
- 許全勝：〈《容成氏》篇釋地〉，收入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
- 陳民鎮：〈清華簡伊尹諸篇與商湯居地及伐桀路線考〉，《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4卷第2期，2018年3月。
- 劉洪濤：〈楚系古文字中的「𧀮（蠅）」字〉，收入鄔文玲主編：《簡帛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6月。
- 蔡哲茂：〈夏王朝存在新證——說殷卜辭的「西邑」〉，《中國文化》第44期，2016年3月。
- ：〈殷卜辭「伊尹舅示考」——兼論「它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8本第4分，1987年12月。

會議論文

- 唐福玖：〈《孟子》引《書》與歷代《尚書》傳本的關係〉，收入林慶彰、錢宗武主編：《第二屆國際《尚書》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萬卷樓，2014年。
- 曹娜：〈《史記》引《尚書》「商書」考論——兼論《史記》對「商書」研究的價值〉，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經學史重探（I）——中世紀以前文獻的再檢討第三次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9年7月18-19日。

蔡哲茂：〈伊尹傳說的研究〉，《中國神話與傳說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97年9月。

學位論文

李泰峰：《〈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晉國史事相關篇章集釋集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碩士論文，2020年。

林錦榮：《上博竹書〈容成氏〉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

程浩：《「書」類文獻先秦流傳考——以清華藏戰國竹簡為中心》，北京：清華大學博士論文，2015年。

網路資料

子居：〈清華簡七《子犯子餘》韻讀〉，「個人圖書館」網站，參見：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1028/17/34614342_698857205.shtml，發表日期：2017年10月28日；瀏覽日期：2022年6月30日。

王寧：〈清華簡《尹至》、《尹誥》中「西邑」和「西邑夏」的問題〉，「國學復興網」網站，參見：<https://www.gxfxwh.com/article-58-1.html>，發表日期：2014年1月20日；瀏覽日期：2022年6月30日。

林少平：〈清華簡所見成湯「網開三面」典故〉，「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參見：<http://www.fdgwz.org.cn/Web/Show/3022>，發表日期：2017年5月3日；瀏覽日期：2022年6月30日。

陶金：〈清華簡七《子犯子餘》「人面」試解〉，「簡帛」網站，參見：<http://www.bsm.org.cn/?chujian/7553.html>，發表日期：2017年5月6日；瀏覽日期：2022年6月30日。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清華簡《尹至》、《尹誥》研讀札記（附：《尹至》、《尹誥》、《程寤》釋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參見：<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352>，發表日期：2011年1月5日；瀏覽日期：2022年6月30日。